



千里援华向战而行的“西班牙医生”

80多年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英勇事迹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自1939年至1945年，在西南大后方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活跃着一群来自欧洲各国的国际援华医护人员，他们从事战地救护、物资护送、卫生防疫、医护培训等工作，与中国抗日军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是西班牙籍，却被人亲切地称为“西班牙医生”。这个称呼与他们中的多数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有关。王蕊

“西班牙医生”的由来

1936年，以弗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下，试图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西班牙共和国，激起世界公愤。50多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挺进马德里与弗朗哥军队作战。在这批志愿者中有一群年轻医生奋战在战场救护前线。

1939年4月，国际纵队伤亡惨重，幸存人员逃亡至相邻的法国，被安置在西班牙——法国边境的难民营中。与此同时，在欧洲，进步的左翼组织正在招募援华志愿者，但响应寥寥，遂转至难民营招募，得到一些医护人员的积极响应。德国医生顾泰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解释道：“我们选择中国，是因为相信反法西斯斗争终将是世界性的，而且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西班牙经验’最大限度地运用到抗日斗争中。”援华德国医生白乐夫也赞同帮助中国就是反法西斯，他写下：“一个伟大却风雨飘摇的国家正在被侵略成瘾的殖民势力所侵占。中国亟待帮助。”1939年秋，宋庆龄在香港接待了抵达中国的国际援华医生，并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将他们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纽约时报》和香港的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到来，将其称为“曾在西班牙服役的医生”。“西班牙医生”的称呼就此传开。

援战而来，无惧困难

到中国后，“西班牙医生”被安排在战时西南大后方贵阳图云关工作。驻地条件十分简陋，甚至恶劣：宿舍是由谷仓改的，满是跳蚤、老鼠，房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正规的厕所，只有蜡烛和柴火聊以照亮、取暖。面对这种状况，他们虽有不适，却在接下来与中国人民相处的日子里，学会了乐观坚韧、苦中作乐。他们积极学习语言，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与中国医务人员一起工作生活，有时休息日还会聚在一起高唱进步歌曲。

战时公共卫生意识和条件都非常落后，军民深受虱子、疟疾、痢疾等传染病困扰。在爱国科学家林可胜总队长的部署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中外医生们协力合作，利用竹子、水桶和高低差，发明了去虱站和淋浴点，有效控制和处置了在军民中广泛传播的虱患、疥疮、回归热、斑疹伤寒等传播疾病。在缺乏自来水和器皿的情况下，他们自制实验器材，取得化验工作重大进展。他们运用在西班牙战场上积累的经验，对伤病进行分类，规范处置措施，减轻病患痛苦。他们还合成维生素制剂和自行配制药膏，治疗中国当时广泛存在的营养不良、疥疮和其他传染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专访图云关，她这样描述这群援华医生：“这些人和我在中国遇到的任何其他外国人都迥然不同……他们作为反法西斯战士而团结一致……吃、穿、住，全都和中国人一样。”

向战而行，一心救护

“西班牙医生”大多是国际纵队成员，是身经百战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一心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

1939年至1941年间，“西班牙医生”多次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表达北上之愿。尽管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北上心愿未能实现，他们仍竭尽所能支持中国共产党。波兰医生傅拉都曾为董必武治病并积极筹集物资支援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医生纪瑞德曾赴五台山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八路军服务；还有不少援华医生深入游击区，将灭虱治疗方法带到游击队。此外，他们还多次写信向国际社会呼吁：为共产党游击队和敌后根据地提供无差别医疗补给和支持。

“西班牙医生”多次表示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上抗日前线，经过不断争取，他们到前线去的要求获得批准。他们和救护总队的其他医生们被分成不同小组，奔赴各大前线。1939年，白乐夫、奥地利医生肯德等奔赴湘赣鄂前线。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常德上空投下携带鼠疫杆菌的棉絮块和谷麦等物，城中暴发鼠疫。肯德带队赶赴常德，在前往疫区途中拦下一行送葬队伍，并从死者肝、脾切片中确诊了B型鼠疫杆菌，与投掷物携带病菌比对一致，实证了日军投细菌弹的罪恶行径。事后他写下《鼠疫横行在常德》的工作报告，为审判日本细菌战犯提供了华中地区细菌战罪证。

1942年，日军从东南亚不断进犯，滇西战事告急。“西班牙医生”随救护总队赶赴滇西前线，多次身入险境奋战在救护前线。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白乐夫、波兰医生戎格曼、波兰医生甘理安、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等人，分别驻守在安宁、楚雄、顺宁、保山、建水等地，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医疗救护。12月，傅拉都等10位援华医生又跟随远征军赴印度蓝姆伽训练营，提供医疗保障。

在滇缅战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医生们作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得知侵华日军投掷细菌弹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时，英国医生高田宜不顾重感冒，坚持参加抗疫。临行前，她因感冒匆忙注射了防疫针，不料引起反应不到24小时就不幸去世，被安葬在贵州图云关。1944年3月，昆明周边回归热流行，柯让道的妻子柯芝兰参加防疫，不幸感染，牺牲在云南。奥地利医生王道在湖北郧阳医院工作期间，积劳成疾致肺结核复发，转院治疗无效，于1945年在重庆病逝。高田宜、柯芝兰和王道三位国际援华医护人员，将生命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长眠于中国大地。

80多年前，英国记者胡德兰曾写下：“中国人不仅为自己而战，也为世界而战。”白乐夫也曾说过：“难道中国的战斗就不是我们的战斗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旗帜的召唤下，国际援华医护人员援战而来、向战而行，在这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与中华民族携手并肩，为了人类的正义而战、为了世界的和平而战，诠释了人类命运与共的真谛。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这群被称为“西班牙医生”的国际援华医护人员。

据《学习时报》

李健吾鼓励杨绛创作剧本

1942年初冬的一天，戏剧家陈麟瑞邀请同是清华大学校友的李健吾、杨绛等人吃饭，席间他们谈到当时上海比较活跃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动态。李健吾和陈麟瑞知道杨绛当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曾获“清华优秀生奖”，还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短篇小说，于是两人鼓动杨绛：“何不也来一个剧本？”

杨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远了；我从来没有留意过戏。”于是，杨绛忙里偷闲，在当年年底完成了自己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喜剧剧本《称心如意》。

看过杨绛的剧本，李健吾十分满意，当即推荐给著名导演黄佐临，黄佐临看过剧本后马上拍板决定排演。在公演之前发广告时，李健吾打电话询问作者如何署名，当时还用原名“杨季康”的杨绛担心一旦失败会出丑，灵机一动，把学名季康二字用切音法化成了“绛”字，取笔名“杨绛”。

1943年5月，由黄佐临执导的喜剧《称心如意》在上海金都大戏院公演，女主角李玉君由著名女演员林彬饰演，李健吾亲自登场，扮演老富翁徐朗斋，演出后好评如潮。《称心如意》在上海剧坛一炮打响，新锐剧作家杨绛一举成名，她的原名“杨季康”反而不甚为人所知了。这一年杨绛只有32岁，丈夫钱锺书还没有成名。当时人们介绍钱锺书时，通常会说“这是杨绛先生的丈夫”。

通过剧本《称心如意》，李健吾发现了杨绛在戏剧方面的创作才华，热情地鼓励她多写剧本。受到鼓励的杨绛一鼓作气，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都大获成功。李健吾大加赞誉，称杨绛的《弄真成假》是继丁西林之后中国现代风俗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由此，奠定了杨绛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席之地。

夏明亮 据《人民政协报》

史良“自首”

1936年12月30日，一位女子来到苏州高等法院门口，从容不迫地说：“我是史良，来自首的。”国民党检察官大吃一惊，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被通缉了一个月的“要犯”，竟然会“主动投案”。

在过去的整整一个月里，史良在男友陆殿栋的帮助下，乔装打扮，四处奔走，转移救国会的重要文件，安排同志们隐蔽。

为了同救国会其他领袖并肩战斗，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她居然又从上海来到苏州主动投案。她与60多个女犯一起被关押在司前街女看守所。在狱中，史良没有一刻闲着，她一面为“七君子”的“爱国有罪”研究对策，准备与敌人开展法庭斗争；另一方面，她又成了女犯人的义务律师，帮助她们分析案情、撰写诉状、据理申诉。她还担任义务教师，教不识字的女性读写，向她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在法庭上，史良充分展现了一个律师的专业素养和爱国情怀。当审判长问她是否赞成各党各派联合救国时，她坚定地回答：“凡是中国人，除汉奸卖国贼外，都应该联合起来抗日。”当审判长挑衅地问联合各党各派是否就是联合共产党时，她从容应对：“救国会的意思是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只是抗日不抗日。”

1937年7月31日，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国共产党及国内外进步人士的营救下，“七君子”终于获释。出狱时，苏州群众一二百人自发来到看守所，高呼抗日救国口号，鞭炮齐鸣，场面感人。史良与其他6位战友一起，在欢呼声中走出看守所，继续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

史良的这次“自首”，让全国人民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压制抗日力量的本质，她用实际行动证明：爱国无罪，救国有理。 时小明 据《人民政协报》

